

# 切莫掉入志愿填报咨询的坑

□胡建兵

2025年全国高考已经结束,接下来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及志愿填报阶段。每年高考,都会有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。其中,针对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一些“高价”志愿填报指导服务,教育部以及多个省份发布提醒。为了更好地服务考生和家长,教育部“阳光志愿”信息服务系统近日焕新上线,提供权威、免费、优质的志愿填报服务。

“十年磨一剑,一朝试锋芒。”高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人未来职业方向。每个考生和家长都会面临志愿填报这一挑战,但大多数考生和家长不够专业,也不了解院校、专业,不明确未来如何规划,从而在填报志愿时难以正确填报,以至于出现高分低报、惨遭滑档的结果。

七分考,三分报。填报志愿是技术活,市场需求促使高考志愿填报服务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。但这些机构的资质和专业水平鱼龙混杂。去年高考结束后,教育部就曾发文专门提醒考生及家长警惕“高价辅导”陷阱,并梳理了志愿填报市场的一些典型问题。比如,一些机构或个人宣称拥有所谓的“内部数据”,其实这些数据并不准确,甚至存在误导性。一些



石向阳绘

机构打出“专家团队”的旗号,实际上这些所谓的“高考志愿规划师”并无相关资质和经验,有的甚至是临时招募的社会人员,按照同一套“台词”给考生和家长辅导。还有一些志愿填报指导机构过度强调某些专业的就业前景,制造“热门专业”假象,刻意渲染焦虑氛围,而背后的真实目的是兜售课程、贩卖咨询服务。

可见,依靠辅导机构填报志愿并不靠谱。不管是戴着各种光环和身份标签的专家“一对一”咨询服务,还是

用大数据护航,不明就里的普通人很容易被骗。志愿填报需要下功夫,但不能过于依赖市场服务。随着高考改革的不断推进,提供给考生的高校和专业选项越来越多,许多高校对大学生转专业越来越开放和包容,志愿填

报“一报定终身”的格局已被打破。因此,对于高考志愿填报还是要根据考生自己的志向、实力等综合把握。

为防止考生和家长掉入咨询机构的“坑”,教育部门应会同市场监管、公安等部门对开展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的市场教育机构进行全面排查,严肃查处经营不合规、服务不规范、收费不合理等行为。同时,家长和考生务必增强防范意识,有关部门从未发放过“高考志愿规划师”这类职业资格证书,若对此信奉不疑,很可能上当受骗。随着高考的结束,相关部门也要加强对市场的治理、相关知识的普及和相关案件的警示。

高考志愿填报辅导属于新兴市场服务,目前还缺乏规范。这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领域,对从业者的政策把握能力、视野、专业素养要求很高,不是看几本书、参加几次培训就能具备的。相关管理部门应加强引导,建立并不断完善服务规范,制定从业标准。另外,志愿填报不应只在高考结束后一个阶段进行,不妨从高一开始,学校就对学生进行职业生涯教育,学生和家长也要考虑未来的专业方向,关注高校的招生录取要求,掌握志愿填报和专业选择的主动权。

(作者系媒体评论员)

微评

• 本期主持人 •

陕西省西安市田家炳中学 冯恒仁

## 设立投诉家长平台有必要吗

近日,江西某地“问政”平台上一位网友提议设立投诉家长平台,引发热议。该网友表示,部分家长不明真相盲目投诉,给教师和学校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。当地教育管理部门迅速回应,承认信访投诉平台确实存在部分家长盲目、虚假投诉现象,并表示将进一步完善信访投诉调查核实机制,及时澄清不实投诉,构建更公平的评价体系,以保障教师和学校合法权益。对此,有人认为设立投诉家长平台给了教师一个与家长权利对等的平台,也有人认为相互投诉只会给家校沟通增加障碍,不利于教育发展。

当网友建议设立投诉家长平台时,当地教育管理部门“对不实投诉及时进行澄清且不纳入教师考核”的回复虽然没有直接满足网友诉求,但至少让教师群体不再感觉孤立无援。构建和谐家校关系的重任不能只让教师扛,应是家校社三方共同努力。从长远看,确实应该建立投诉约束机制,避免教育公共资源被无端浪费。(安徽省芜湖市三山经开区官河小学 吴启花)

为设立投诉家长平台叫好。现在一些家长捕风捉影投诉成风,仅凭臆想就随意举报,严重影响了教师考核和学校声誉。投诉的权利是平等的,设立家长投诉平台既能让教师在面对恶意投诉时有处申诉,维护自身权益,也能促使家长理性行事,促进家校关系走向平等、和谐。(福建省上杭县庐丰横岗小学 周继章)

从权利属性上说,设立投诉家长平台这种制度对抗实不可取。家长投诉权本质是监护人对教育的监督权、参与权的延伸,而教师行为已有教师法及教育管理部门监管。赋予教师投诉家长的权利其实是将“专业监管责任”扭曲为“民事对抗”,模糊了公权与私权边界,会导致更大的失衡。其实,教育需要修复性正义而非惩罚工具,与其用投诉解决问题,不如强化现有的纠偏功能,完善澄清公示制度。(浙江省温州市实验小学 徐雪蝉)

关于设立投诉家长平台的诉求,实质是对广大家长理解和支持教师工作的强烈渴望。家长有监督权,但也应尊重专业并学会换位思考。学校应畅通沟通渠道,搭建一个可以帮助家长解决问题的校级平台。教育本应是家校协作的共同体,是需要信任与合作的系统工程。当家校相互理解、相互支持,学校教育才能回归育人本质,为孩子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。(江西省赣州市第四中学 李英)

与其设立投诉家长平台,不如设立教师维权平台。教师维权平台的设立能为教师提供发声渠道,在遭遇不合理诉求时及时获得支持与帮助,通过专业评估和公正处理,维护教师尊严与权益。同时,也能让家校关系回归理性,避免矛盾激化。(湖南省石门县三圣乡樱桃小学 刘斌)

## 如何让戒尺不再“烫手”

局内人

□李纪超

生问题视而不见,受影响最大的可能还是学生——缺乏必要的惩戒,会导致学生责任认知缺失、法律规则意识淡薄,此时若家长宠溺孩子而学校又不能及时补上这一课,导致其野蛮生长,将来走上社会可能会做出更多不良行为。

当时代环境和制度供给改变了,教师是被动卷入舆论的漩涡,还是积极转变认识、改变行动?我认为,教师和教育管理部门都要主动适应教育环境之变,从立德树人出发,构建良好教育生态。

一是用科学的探索为学校和教育赋能。构建科学的教育关系和育人文化,学校和教师应当适应新型教学关系,遵循教育规律,依法履行职责,通过积极管教和合理惩戒及时纠正学生错误言行,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、责任意识。实践中,学校和教师可以尝试结合本校学生特点,依法制定、完善校规校纪,明确学生行为规范,健全实施教育惩戒的具体情形和规则,不因循废食。这也是《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(试行)》所倡导的。

二是用细化的制度为教师撑腰。用完备的制度规范平衡教师权利与义务,也为教师履职提供指引。《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(试行)》开启了教育惩戒制度体系建设的第一步,虽然只是一个开始,但也为下一步继续完善留下了注脚和期待。学校和教师要立足教育教学实际,积极探索,相关部门也要不断吸收一线生动、有效的教育惩戒方式,逐步细化相关规范和惩戒边界,让实施教育惩戒的主体有章可循。

三是用公正的处理为学校和教育师托底。教育管理部门既要体罚惩戒,也要为实施教育惩戒托底。当教师因合理、合规行使教育惩戒权而被学生或家长举报时,相关部门和学校管理者要实事求是、追求真相,不能为了息事宁人让教师承担全部责任。今年4月最高法院发布涉校园管理民事纠纷典型案例中,有一则“学校不因实施合理的教育惩戒行为而承担侵权责任”就释放了明确的信号。可见,合法合规处理纠纷事件才是对学生最好的保护、对教师最大的支持。

落实教育惩戒权需要标本兼治,秉持长期主义,不断完善、持续改进。家长和社会要给予学校、教师充分的信任、理解和包容,支持学校和教师规范开展教育教学活动,共同构建良好教育生态。当戒尺依法安放,教育方能水到渠成。(作者单位系山东省烟台市教育局)

## 教育之怪现状

## 拍毕业照不是一场消费竞赛

□杨凤娟

6月毕业季,拍摄毕业照是学校的一个常规操作。然而近年来,互联网上屡屡爆出“天价毕业照”等不良现象,让温馨的告别仪式演变为一场消费竞赛。最近就有一位福建的家长表示,当地一些学校以毕业留念名义组织拍摄高价毕业照,或借助“自愿参与”之名变相收费。当地教育管理部门迅速回应,明确中小学和幼儿园毕业照拍摄费用不得向家长收取,由学校承担,家委会也不得以任何形式统一组织或收取费用。

毕业照承载着师生之间的美好情谊,是学生时代的一个重要仪式。然而这份情感不应成为家长“被自愿”买单的理由。一些学校或默许、或推动,借由家委会组织“高规格”拍摄项目,不仅让原本简洁的毕业仪式变成了一场消费竞赛,也在无形中增加了家长的经济负担。尽管这些做法披着“自愿”的外衣,但在现实中往往沦为变相强制,学生不参与便很可能被孤立集体之外。这种微妙的心理压力,对家庭经济

条件一般的学生及家长而言并不公平。更值得警惕的是,有的学校并未公开提出收费要求,而是默认由家委会出面操作,在形式上规避了监管,实质上仍然突破了教育收费的政策红线。这种责任“外包”行为模糊了管理边界,导致家委会的职能被严重误解和滥用。家委会本应是家校沟通的桥梁,而非代学校行事的“第二管理层”。一旦其职责被误用,不仅损害了家委会的公信力,也为教育治理埋下隐患。

对于类似事件,需要教育管理部门梳理毕业照的“收费逻辑”并主动回应,一方面明确由学校承担毕业照的拍摄费用,划清公共责任与家庭支出之间的界限;另一方面禁止家委会越权操作,从源头上遏制学校利用第三方收费的做法。这不仅是对制度的规范,还是对教育公平的捍卫。

我们必须看到,关于毕业照、校服、课外实践等名目的收费问题频频引发舆论关注,归根结底是部分学校对教育资源分配与公共责任边界的

认识模糊。教育经费的使用本应优先保障学生的基本学习和成长需求,拍摄毕业照作为普遍性、集体性活动,理应纳入学校预算统筹安排。让所有学生在无负担的前提下留下青春纪念,不仅是尊重个体的表现,更体现了教育的人文关怀。

在强调教育公平和治理规范的背景下,类似拍摄毕业照收费这种“隐形消费”现象应当引起警觉。教育不是商业活动,更不应成为某些机构谋利的空间,任何加重家庭负担的收费行为都必须有明确的规则约束与行政监督。在制度之外寻求变通的灰色操作空间,最终损害的是学校形象与公众信任。

毕业照的意义应回归纪念成长、珍藏回忆的本质,而不是攀比价格与追求奢华。唯有厘清边界、强化监管、落实责任,才能让孩子在最值得纪念的一刻留下一张温暖的合影。(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教师发展中心附属小学)

## 纵横谈

## 无作业日并非一无了之

□杨强劲

在考试超频、作业超量等教育顽疾列入教育部发布的16条负面清单后,上海快速响应推出“无作业日”。对此,有人担忧无作业日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,有教师也因感不写作业该怎么教学。其实,这些都是对“无作业日”的误解。表面上看,这一举措减少了学生的作业量,本质上则是一场指向教育生态重构的深层变革,试图打破课堂、作业、考试的机械循环,让教育回归培养完整的人的目标,是以系统思维推进教育观念、机制与方法的全面转型。

理解“无作业日”的价值先要重新定义“作业”。在应试教育观念影响下,有人将学习窄化为知识复刻,让学生反复抄写、计算,教师机械批改,这种基于行为主义理论的训练能短期强化记忆,却难以培养高阶思维和实践能力。“无作业日”指向建构主义学习观,将知识作为在真实情境中主动建构的产物。具身认知理论表明,认知发生在身体与环境的互动中,当孩子观察植物生长时,不仅学到了生物知识,还在记录、分析中锻炼了逻辑思维;在家庭劳动中整理房间时,孩子不仅掌握了分类技巧,还在规划中培养了责任意识。这种“做中学”的方式比机械抄写更符合儿童

认知规律,也更能激发学习内驱力。不过,落实“无作业日”政策仅凭作业形式的改变远远不够。

首先,要构建“家校社共生教育”的协同机制,让教育责任均匀落于学校、教师和家长身上。学校要从“作业布置者”转型为“活动设计者”,提供灵活、有效的实践指南。比如推荐“家庭劳动清单”“社区调研主题”,让家长和孩子有明确的行动方向;家庭要从“监工”转变为“陪伴者”,与孩子一起在实践中感受学习的乐趣;社会则需要打开公共资源的围墙,博物馆、科技馆、艺术中心等设立“无作业日专属时段”,为孩子提供免费或低价的实践空间。当家校社形成合力,“无作业日”才能从学校的事变成全社会的教育行动。

其次,完善、升级教育评价体系,若评价体系仍停留在分数至上,“无作业日”的减负效果终将被校外培训反噬。落实“无作业日”政策,需要构建发展性评价体系,关注学生个体的进步幅度而非横向比较,纳入艺术感知、身体动作、人际交往等多元能力指标,通过成长档案、学习日志等工具记录实践中的思维轨迹。比如,一个在社区调研中主动帮助老人的孩子,他的同理心比试卷上的分数更能反映教育成效。一个在家庭劳动中

学会统筹时间的孩子,他的时间管理能力比奥数奖杯更值得被看见。当评价从“筛子”变成“镜子”,家长才不会因无作业而焦虑,学生才能在真实体验中找到成长的自信。

最后,抓住教师这个关键变量。当前,教师普遍面临非教学事务过重与创新压力过大的双重困境。要让“无作业日”从政策要求变为教育自觉,需要为教师松绑赋能。一方面,严控非必要进校园事项,让教师有时间设计有意义的实践活动;另一方面,建立区域教研共同体,共享“无作业日”课程资源包,开展基于案例的行动研究,帮助教师降低创新门槛。更重要的是,提升教师的角色认知,让教师由知识传授者转向学习设计师,从“学习教练”升级为成长导师。当教师不再被琐事束缚,才能把精力投入到课程设计中,让“无作业日”的每一分钟都成为学生成长的契机。

从“有作业”到“无作业”,不是简单做减法,而是教育理念的升级。当教育者用更包容的心态对待孩子成长,用更系统的思维实施育人工程,孩子才能学得更有温度、更有趣味、更有力量。

(作者单位系上海市松江九峰实验学校)